



圖一 河北宣化出土遼張世卿墓「備宴圖」壁畫（《宣化遼墓》，彩版61）

遼代陶瓷在製作工藝和造型紋飾上所受到的影響，大多來自於唐代遺風及同時期五代、北宋先進陶瓷工業。但經過吸收轉化後，所呈現出的強悍草原民族性格，是遼瓷中最引人注意的。以下大體將遼代陶瓷區分為「遼產陶瓷」與「漢地輸入陶瓷」兩類分述之，以說明遼代陶瓷所具有之多樣化特質。

### 遼產陶瓷

意指遼國疆域內所燒造的陶瓷，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遼國所屬上京道、中京道、東京道、西京道、南京道之五京各府管轄地區（即今日的內蒙古、遼寧、北京、山西等地），發現了不少燒造陶瓷的窯業遺跡。屬遼上京臨潢府者，有發現於內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東鎮的白音戈勒窯、阿魯科爾沁旗的東沙布爾臺諸窯，以及巴林左旗遼上京城內的南山窯。屬中京大定府者，有發現於內蒙古赤峰的缸瓦窯。屬東京遼陽府者，有位於遼陽的江官屯窯。屬於南京析津府者，有發現於北京的龍泉務窯、密雲小水峪窯以及房山瓷家務窯。屬於西京大同府者，則以山西渾源界庄窯為代表。上述窯場大抵位於遼國五京各府治週邊地區，顯示窯業生產與居民消費需求的密切關係。從窯業技術與製瓷工藝發展狀況來看，契丹窯業與唐宋時期中國北方窯業關係密切，窯爐結構同樣以半倒焰式的饅頭窯（馬蹄窯）為主，製坯有轆轤成型法，而模具則同時運用在壓模成型與裝飾手法中。窯具可見匣鉢，以及墊柱、墊柄、三叉形與工字形支釘等支燒工具，這些都是漢人窯業已發展成熟的窯業用具，可見契丹窯業吸收了大量十世紀



圖二 遼寧赤峰缸瓦窯址出土「官」字刻款匣鉢（《古代窯址報告集》，圖版拾肆）

以後漢人窯業已發展成熟的技術成果。史料多次記載了契丹統治階級對中原山西、河北等地漢人的擄掠，其中亦包含不少技術工匠，如《遼史》卷七十五，列傳第五（王郁傳）稱：耶律阿保機「遼都從皇太子討之。」

西元九〇七年唐朝滅亡以後，各地藩鎮自立為王，進入了歷史上群雄紛立、政局混亂的五代十國時期。原本是東胡民族之一，興起於今日內蒙古、遼寧一帶西拉木倫河（潢河）及老哈河（土河）流域的契丹族，便在此時逐漸壯大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（九一六—九二六）時，建國都於上京臨潢府（今日內蒙古巴林左旗），東滅渤海國，到了遼太宗耶律德光（九二七—九四七）時，遼國已是北至前蘇聯貝加爾湖，南達河北京津地

區的超級大國。契丹人所建立的大型聚落與城市在北方草原地區相繼崛起。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，以及遼國與南方漢人的互動持續增加，農業、經濟和各類手工業日趨興盛。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帝國，雄據中國北方達兩百餘年，與西夏、北宋形成鼎立之勢。到了西元十二世紀初，遼國被崛起於東北的女真族（金朝）所滅，耶律大石率殘部徙遷中亞，建立西遼（Karakhan），但亦在十三世紀亡於蒙古，契丹族成爲了中國典籍文

獻中的「歷史民族」。但隨著近一個世紀以來的考古新發現，使我們對於遼代物質文明，有了更豐富而多樣的認識。在屬於遼代的各種遺蹟、遺物中，遼代陶瓷所展現的民族特色，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份。遼代墓葬中所發現大量的陶瓷文物，類型多樣、精粗有別，清楚的向我們揭示了遼瓷造型和紋飾的獨特面貌。而遼代墓室所發現的壁畫中，也出現了大量描寫墓主日常生活的題材，呈現出遼國臣民使用陶瓷的真實景況（圖一）。

# 呈現草原民族特色的 遼代陶瓷藝術



盧泰康



圖六 遼寧法庫葉茂臺遼墓出土盤口長頸瓶（《中國陶瓷全集9遼西夏金》，圖53）



圖四 駙馬贈魏王墓出土白瓷盤口長頸瓶（《中國陶瓷全集9遼西夏金》，圖82）



圖五 內蒙古敖漢旗出土白瓷酒具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41）

極大，所見器形種類繁多，幾乎包含了目前所知各種器類，燒造年代較早者，如內蒙古赤峰大營子發現之遼穆宗應歷九年（九五九）駙馬贈魏王墓出土的白瓷盤口長頸瓶（圖四），高四〇·三公分，器底可見「官」字刻款。各類遼白瓷中，除了反映契丹本族傳統器形者，亦有不少模仿漢人餐

飲用器，如內蒙古敖漢旗出土的一組白瓷酒具（圖五），包含帶蓋注壺、溫碗、杯蓋及盞托，器身裝飾浮雕蓮瓣紋，壺底刻「官」字款，製作風格與精細程度已與中原定窯無異。此外，尚有模仿磁州窯裝飾剔花者，如遼寧法庫葉茂臺遼墓出土的盤口長頸瓶（圖六），全器先施白色化妝土，

器身中段剔刻纏枝牡丹花葉紋，化妝土剔除後的部份，呈現褐色胎骨，最後施以透明釉入窯燒成。  
單色低溫釉器與三彩器，是遼人所製作陶瓷中極富色特的類型，燒成溫度約在攝氏八〇〇至一一〇〇度左右。根據考古出土資料，契丹人燒造低溫釉器的時間，可以追溯至遼朝

還。……天贊二年秋，郁及阿骨只掠地燕、趙，攻下瓷窯務……。」另在當時文人胡嶠回憶起他在遼上京臨潢府所見的狀況，看到很多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工匠，大多是從晉、冀遷徙而來的漢人。此外，在契丹窯業發展的過程中，也出現了某種形式的官府管理機制或「官搭民燒」的窯業生產模式。例如內蒙古赤峰的缸瓦窯址，就發現了具有「官」字刻款的匣鉢（圖二）。而遼墓出土陶瓷中，亦不時可見器底刻有「官」款的瓷器。

遼地所生產的陶瓷，大致可分為三種，一為低溫灰黑陶器，其次為高溫陶瓷，包含白瓷、白地刻花與褐

器表黑亮磨光，盤口呈杯狀外撇，頸部收束，器身以細線均分為瓜稜狀，下腹近底處可見典型契丹風格之壓印篋紋帶。  
白瓷是遼代本地窯場燒造的最大宗產品，一般可分為兩種，一種是胎色潔白、釉色瑩潤的高級製品，數量較少。另一種為胎土含鐵量較高的雜色胎，大多會施以白色化妝土後，再上透明釉入窯燒製。遼白瓷的製作工藝受到五代、北宋時期定窯的影響極大，故外觀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，但從胎、釉成份檢測分析數據看來，遼白瓷仍存在不少自身特性。遼白瓷具有高鋁（ $Al_2O_3$ ）低矽（ $SiO_2$ ）的特徵，燒成溫度在攝氏一二四〇至一二七〇度左右。胎與釉中的鈦（ $TiO_2$ ）含量，普遍較定窯來的高，而遼白瓷釉中主要媒熔劑—氧化鈉（ $Na_2O$ ）亦普遍較高（從文玉等，〈遼代白瓷研究〉，《一九八九年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論文集》，一九九一：頁三六四—三七〇；北京市文物研究所，二〇〇二：頁四四—四六一）。

遼白瓷在契丹窯業中的生產量



圖三 耶律羽之墓出土黑陶盤口束頸壺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121）

遼白瓷在契丹窯業中的生產量

遼白瓷在契丹窯業中的生產量



圖十一 內蒙古札魯特旗遼墓出土遼三彩器（《199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》，圖120）

至於遼三彩器，雖然同樣為低溫釉陶，但出現的時間較晚。儘管契丹人早已具備燒造低溫釉陶的能力，且製作三彩器並不存在技術問題，因為低溫單色釉與多彩釉的燒造工藝大抵相同，但一直要晚至十一世紀後期左右，遼三彩才開始在遼墓葬中頻繁出現，做為隨葬用冥器（圖十一），彷彿是突然出現並成為契丹臣民所珍視之物。有關三彩器在遼代後期逐漸增

加的原因為何？這可能與當時社會上的特定需求有關，目前普遍為學界所接受的說法，是原先以貴重金銀器做為陪葬品的厚葬之風，在遼代後期逐漸受到官方限制，而遼國經濟上的衰退，也使得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金銀器皿大為減少，由於低溫三彩器具備了釉色艷麗、紋飾造形多樣，且燒製技術限制不高的特點，當然成為了當時用做陪葬冥器的最佳選擇。

從陶瓷史發展歷程來看，遼三彩確實繼承了唐三彩的某些技術傳統，但唐三彩與遼三彩前後流行期間，仍存在了長達數百年的缺環有待釐清。而在器形與裝飾特徵上，遼代的三彩器已經發展出不同於唐三彩的面貌，目前已知器形包含了海棠花式長盤（圖十二）、圓盤、方盤（圖十三）、注壺、扁壺、硯台（圖十四）、各類動物形滴注（圖十五）與陶哨、神佛造像（圖十六）等等。遼三彩器中大量出現餐飲用器形，甚至量龐大的各類陪葬人俑。而遼三彩中的人物造形，則以神佛造像為主，反

映佛教信仰在北地的盛行。由此可見，遼人對三彩器的運用與看待方式，已與唐人截然不同。再從裝飾技法觀之，遼三彩以模具印花為主，低溫釉色種類較少，大抵僅見黃、綠、白三色，儘量配合圖案佈局施釉，塗佈於紋飾之上，完全不同於唐三彩器常見的多種釉色自然潑灑、交錯融流的效果。

此外，另一個遼代低溫釉陶發展的重要成就，是在釉藥組成配方上的創新。漢唐以來中國的低溫釉系，大多以鉛（ $PbO$ ）做為釉藥中主要的媒熔劑，但在北京龍泉務遼墓址所出土的低溫琉璃釉器中，有了極為重要的發現。透過檢測分析得知，部份標本釉藥組成上出現了氧化硼（ $B_2O_3$ ）含量極高，而鉛含量極少的案例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，二〇〇二：頁四六一—四六四），這種含鹼鈣硼的硅酸鹽釉，是以前所未有的新發現，可以說是中國陶瓷技術史上的一大突破。

以下再例舉幾種極具遼國契丹本族特色的陶瓷器形，並進一步說明其特徵。



圖八 耶律羽之墓出土綠釉印花方磚（《探尋逝去的王朝—遼耶律羽之墓》，圖29）



圖七 內蒙古科左後旗呼斯卓契丹墓出土陶壺（《文物》1983:9，圖版貳）



圖十 河北宣化M4遼墓「宴樂圖」壁畫（《古代窯址報告集》，彩版98）



圖九 內蒙古解放營子遼墓出土黃釉花式套盒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79）

建國以前，以內蒙古科左後旗呼斯卓發現的契丹墓為例，年代約在晚唐，所出土兩件盤口束頸壺（圖七），分別以施黃釉與青黃釉，其器形具有契丹風格中盤口束頸壺的特徵，坯體製作規整，施釉與燒造技術成熟，可見契丹人早已具備了燒製低溫釉陶的技術。到了十世紀中期左右，低溫釉的生產則呈現了多樣化的發展，例如上述耶律羽之墓出土文物中，除了有裝飾繁複貼花的綠釉盤口穿帶瓶之外，主墓室四面以綠釉壁磚砌成，地面則舖以綠釉印花方磚（圖八），顯示了低溫釉燒製技術已被擴展運用於磚瓦窯業。之後百餘年間，各類黃、綠、低溫釉陶器始終是契丹陶窯中的重要品類，而在不斷漢化的日常生活中，低溫釉陶器亦朝向精緻化發展，如內蒙古解放營子遼墓出土的黃釉花式套盒（圖九），全套共五件，盒身成橢圓四瓣花形，器壁押印花草紋，可疊套陳設，亦可分開放置，類似的餐飲用具圖像，在十二世紀初的遼墓壁畫中亦可得見（圖十），反映了遼地居民重視生活品味，已發展出精緻的餐飲



圖十八 耶律羽之墓出土白瓷提樑式雞冠壺  
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



圖十七 駙馬贈魏王墓中出土白瓷穿孔式雞冠壺（《中國陶瓷全集9遼西夏金》，圖83）



圖十九 內蒙古翁牛特旗廣德公鄉  
出土綠釉雞冠壺（《契丹王朝—  
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67）



圖二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黃釉  
雞冠壺（《中國陶瓷全集9遼西  
夏金》，圖103）

**雞冠壺**  
雞冠壺的造形，為模仿契丹傳統使用之皮囊壺。這樣的皮製盛水器，除了陶瓷器仿其造形外，尚有木製及金屬製品。雞冠壺依其器形特徵

大致可分為兩種，一種為穿孔式，用以繫繩提拿，壺頂繫孔處扁平類似雞冠；另一種為提樑式，可直接提取攜行。雞冠壺歷經遼代兩百餘年的生產燒造，器形變遷大致可分三階段：早期雞冠壺造形上扁下圓，器腹飽滿，器身明顯保留了模仿皮頁縫合的條狀裝飾，如內蒙古赤峰發現之駙馬贈魏王墓中出土的白瓷穿孔式雞冠壺（圖十七），以及耶律羽之墓出土白瓷提樑式雞冠壺（圖十八）。到了遼中期以後，器身逐漸拉長，且裝飾手法增加，可見線刻卷草紋或貼塑裝飾。又如內蒙古翁牛特旗廣德公鄉發現之綠釉雞冠壺（圖十九），器頂為雙繫孔，孔後尚見猴形立體裝飾。到了遼代晚期，穿孔式雞冠壺逐漸消失，僅存提樑式雞冠壺，此時成形技法，大量以拉坯製作為主，器身多呈修長筒狀，提樑以簡單捏塑製成（圖二十）。

**鳳首瓶**  
鳳首瓶在唐代陶瓷中已有所見，其造形應轉化自西亞、中亞地區傳來的金銀器。而在十一世紀以後，契丹因受到回鶻與突厥器物的影響，陶瓷中亦出現了鳳首瓶。遼代鳳首瓶器身少見把柄與流嘴，大多施以低溫綠釉、黃棕釉，細節特徵已與唐代有別，相當具有北地特色。年代較早的遼鳳首瓶，鳳首製作精細，形象寫實，以遼寧北票水泉遼墓出土的綠釉鳳首瓶為例（圖二一），鳳首立體形塑曲喙銜珠，鳳首與翎毛托住花瓣造形的杯口，細頸以下肩部可見浮雕蓮瓣紋。到了遼代晚期，鳳首瓶造形逐漸趨向生硬簡約，製作較粗糙，頸部多見弦紋裝飾（圖二二）。至於南方宋朝燒製類似器物的窯場較少，目前所知產量較大之窯場，以廣東潮州筆架山窯與廣州西村窯為代表。筆架山



圖十五 內蒙古寧城縣榆樹林子鄉出土摩揭形三彩注壺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83）



圖十六 北京龍泉務窯出土三彩觀音座像（《北京龍泉務窯發掘報告》，彩版圖七）



圖十二 內蒙古寧城縣榆樹林子鄉出土海棠花式長盤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97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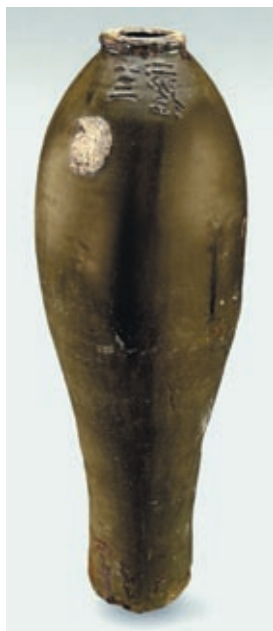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三 出土花式方盤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98）



圖十四 內蒙古寧城縣石佛鄉出土三彩陶碗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99）



圖二六 內蒙古赤峰發現之綠釉束口折肩罐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70）



圖二五 內蒙古巴林左旗出土醬釉雞腿瓶（Gilded splendor: Treasures of China's Liao Empire (907-1125), 圖181）

五代、北宋政權輸入陶瓷，這些進口的中國陶瓷大多為中原或南方著名窯場的高級產品，反映了當時契丹與南方漢人的密切交流。遼國最早輸入瓷器的管道，是透過契丹軍隊南下的掠奪，而在和平時期，遼國與五代、北宋、吳越各政權之間的外交活動中，貢使往還交聘餽贈，亦成為陶瓷輸入



圖二七 耶律羽之墓出土白瓷盤口穿帶瓶 一級文物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

的來源之一。到了十世紀晚期至十一世紀初，遼宋邊境榷場貿易迅速開展，遼以銀錢、布皮、鹽物、羊馬駝畜等，博易中原之茶、絹帛、漆器、銅錢、穀物、香藥等貨。而此時漢地所生產各類陶瓷，更透過了正常貿易管道輸入北地。目前已知銷入遼地的瓷種，來自於中國南、北兩地著名窯場，包括河北邢窯與定窯、陝西耀州窯、浙江越窯，以及江西景德鎮窯。位於河北臨城、內邱的邢窯與曲陽的定窯，以燒造白瓷為主。由於邢窯瓷器所處年代較早，故僅被發現

於十世紀中期左右的遼墓中，輸入數量甚少。至於定窯則對遼國窯業技術影響頗大，且輸入器形多樣，其中不乏精美高檔白瓷。近年耶律羽之墓所出土的盤口穿帶瓶（圖二七），器高三七·五公分，體型碩大，胎質潔白，釉色瑩潤，可能為邢窯或定窯產品。其它如陳國公主墓出土的白瓷蓮瓣紋蓋罐（圖二八），蓋頂寶珠鈕，器身刻浮雕蓮瓣紋，器底刻「官」字款，屬典型定窯白瓷。此外，定窯所燒造的黑釉、鐵紅釉器，亦有部份被輸入遼國。

窯燒造的青白瓷鳳首瓶（圖二三），鳳首上之杯口細小，器腹圓鼓，頸部有弦紋裝飾。西村窯窯燒造青瓷鳳首瓶實為執壺，前流後柄，鳳首上之花



圖二三 廣東潮州筆架山窯址出土青白瓷鳳首瓶（《宋代筆架山潮州窯》，圖47）



圖二二 遼寧省博物館藏黃釉鳳首瓶（《中國陶瓷全集9遼西夏金》，圖106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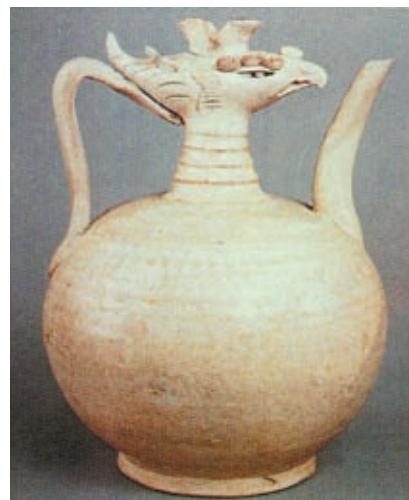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一 遼寧北票水泉遼墓出土綠釉鳳首瓶（《中國陶瓷全集9遼西夏金》，圖113）

式杯口亦小，器腹渾圓矮胖。廣東窯業專營海外輸出，東南亞菲律賓賓、印尼等地，皆發現了此類鳳首執壺（圖二四）。



圖二四 菲律賓、印尼發現之廣州西村窯鳳首執壺（A Ceramics Legacy of Asia's Maritime Trade, 圖23）



### 漢地輸入陶瓷

遼國除了自行生產陶瓷外，亦從

### 束口折肩罐（盞耳壺）

造形特徵為撇口、束頸、折肩、鼓腹、圈足，肩腹轉折處多有帶整的環形把手（圖二六）。此類器形屬契丹人特有器物，未見於五代、北宋時期中原地區生產的陶瓷，應是來自西方中亞、西亞地區文化之影響，為模仿突厥或粟特金銀器，相同器形在契丹金銀器中亦可得見。

**雞腿瓶**  
為遼地常見之實用裝盛器，遼墓壁畫所描繪的契丹人宴飲場景中，常見此類陶瓶插置於特製木座上或地上。器形特徵為小口，厚唇，圓肩，身形粗大高長，狀如雞腿，故而名之，器身多施醬或茶葉末釉。以內蒙古奈曼旗陳國公主墓（一〇一八）出土雞腿瓶為例，器身呈圓筒狀，器表施黃綠色茶葉末釉。遼代晚期的雞腿瓶（圖二五），器身轉為修長，腹部以下漸收，底徑變小，肩部常見刻劃年款與墊燒痕跡。

圖片出處

1.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，《北京龍泉窯發掘報告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2年。
2. 中國歷史博物館、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北京：中國藏學出版社，2002年。
3.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哲里木盟博物館，《遼陳國公主墓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3年。
4. 李炳炎，《宋代筆架山潮州窯》，廣東：汕頭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。
5.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，《宣化遼墓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。
6. 邵國田主編，《敖漢旗文物精華》，赤峰：內蒙古文化出版社，2004年。
7. 首都博物館編，《首都博物館藏選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。
8. 馮永謙，《赤峰缸瓦窯村遼代瓷窯址的考古新發現》，收於《古代窯址報告集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，頁386-391。
9. 馮永謙主編，《中國陶瓷全集9遼西夏金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00年。
10. 張柏忠，《科左後旗呼斯卓契丹墓》，《文物》，1983年9期，頁18-29。
11. 國家文物局主編，《199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。
12. 蓋之庸，《探尋逝去的王朝—遼耶律羽之墓》，呼和浩特：內蒙古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。
13. Lam, Peter Y.K., "Northern Song Guangdong Wares," A Ceramics Legacy of Asia's Maritime Trade, Malaysia: The Southeast Asia Ceramic Society, 1985.
14. Shen, Hueh-man ed., *Gilded splendor: Treasures of China's Liao Empire(907-1125)*, Asia Society: New York & 5 Continents Editions srl: Milan, 2006.



圖三三 陳國公主墓出土青瓷花對蝶紋盤局部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53）

**結語**

西元十至十二世紀初的遼國陶瓷，是中國陶瓷史上相當具有鮮明特色的品類。契丹政權在壯大發展的過程中，迅速吸收了華北地區的中原陶瓷製作技術，不僅燒造各類陶瓷製品滿足國內消費需求，同時也持續製作不少具有契丹族自身特色的陶瓷產品。另一方面，大量中原陶瓷亦在此時傳入遼國，使用者包含契丹貴族與漢族仕宦等各社會階層，反映了當時遼、漢之間在文化認知、社交儀式、餐飲習慣、審美與價值觀等多方面的互動與交流。

作者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助理教授



圖三四 內蒙古敖漢旗白塔子遼墓出土青白瓷香爐（《敖漢旗文物精華》，圖155）



圖三二 北京八寶山韓伏墓出土青瓷注壺（《首都博物館藏選》，圖64）



圖三一 耶律羽之墓出土青瓷夾耳罐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33）

十世紀以後中國北方燒造青瓷的重要窯口，是陝西銅川的耀州窯。輸入遼國的耀州窯青瓷，頗有一定數量，如遼寧法庫葉茂臺遼墓所出土青瓷別花蓋罐（圖二九），器身裝飾複瓣花葉紋，釉色瑩潤淺青。陳國公主墓出土的青瓷花對蝶紋碗（圖三十），釉色青綠，碗身花式造形，屬北宋前期的耀州窯器。

晚唐以來，南方浙江地區的越窯，以燒造「千峰翠色」的青瓷器為代表。越窯開始輸入遼地的時間，約略在十世紀中期左右，如耶律羽之墓

所出土青瓷夾耳罐（圖三一），器蓋繫耳形制特殊，經陶瓷學者謝明良考證後確認其應為越窯產品。根據文獻史料可知，此時期輸入的越窯瓷器，可能與南方吳越國透過海路進獻貢物有關。到了西元九七八年北宋滅吳越以後，精緻的越窯青瓷仍持續不斷輸入遼國，如北京八寶山韓伏墓（九九五）出土的精美越窯注壺（圖三二）、蓋托、杯碗，以及陳國公主墓出土越窯青瓷花對蝶紋盤（圖三三），皆顯示了十一世紀前半，遼國上層階級對越窯器的重視。

北宋時期江西景德鎮窯燒造的青白瓷，在十一世紀以後開始輸入遼國，並在北宋晚期達到高峰。據彭善國研究統計，遼國境內所發現青白瓷的數量，接近所有進口陶瓷總數的六成，可見其受到遼境人民歡迎的程度。至於在器物類型上，輸入遼國的景德鎮窯器包括碗、杯、盤、注壺、瓶、鉢、香爐（圖三四）、盒等，器形多樣。



圖二八 陳國公主墓出土白瓷蓮瓣紋蓋罐（《契丹王朝—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》，圖224）



圖二九 遼寧法庫葉茂臺遼墓出土青瓷蓋罐（筆者攝於遼寧省博物館）



圖三十 陳國公主墓出土青瓷花對蝶紋碗 一級文物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